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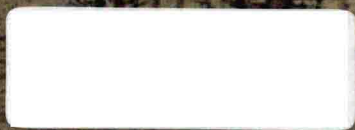
经济学家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茶座

主编：胡长青 执行主编：詹小洪

2015.4 总第70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周 文 西门庆的经济化人格 / 103
 周 燕 两只“虾”的验证 / 109
 沈 凌 “马车”上面的“马车夫” / 113
 张霖琳 国企高管职位变动：那些年，那些事 / 115
 吕 伟 如何做大体育产业的“蛋糕”？ / 120

经济评论

- 赵红军 教师 Vs 医生，谁的社会贡献更大？ / 124
 陈 霞 “关系”在中国公司治理中的价值 / 127
 古志辉 从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看儒家传统与投资者保护 / 132
 刘 云 风险社会、风险共治与风险意识 / 137

经济学人

- 蔡晓峰 “杨纪琬计划” / 141

经济史话

- 林超超 社会主义托拉斯为何“夭折”？ / 146
 周明长 “三线建设”与中国内地城市的新生 / 151

财经阅读

- 熊秉元 “没有事实，只有阐释”
 ——《把书读对》一文续貂 / 156
 聂辉华 一个博弈矩阵破解《三体》奥秘 / 161
 李辉文 高级有趣的经济学
 ——《跟〈西游记〉学创业》读后感 / 166

他山之石

- 杜 创 硅谷租房故事
 ——也谈“企业、市场与法律” / 169
 包 特 BBC“中国学校”说明了什么？ / 1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70辑/
 胡长青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1

ISBN978-7-209-09501-3
 I. ①经… II. ①胡… III. ①经济
 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第017417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903
 Email: chazuo8903@126.com
 微信公众号: cneconomist
 书友QQ群: 311957096
 微博: weibo.com/sdpress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 (0531) 8209802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11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 18.00元

生理学已获诺奖，经济学还有多远？ / 包特

套用一句俗话：2015 年对于中国科学界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里最为不平凡的事，就是屠呦呦教授在 10 月份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教授获得诺奖对于中国科学界有着不平凡的意义，也是极大的鼓励！

面对自然科学工作者取得的如此大的成就，经济学者和大众很可能会关心：中国经济学家何时有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导向或启发的研究何时有机会获得诺奖？

作为初入行不久的年轻人，我不敢对这个问题妄下结论。但我还是愿意以较为乐观的心态预想：也许不会很快，但应该不会太久。

短期内的困难不难理解。以中国内地的情况来说：我们全面系统地接触和接受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时间并不长，很多方面可能缺乏积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来说：它设立的时间不长，到目前为止颁发给非西方世界获奖者的次数屈指可数。同时，相比自然科学奖，它的“终身成就奖”意味更浓一些。研究者如果不能建立起广有影响的学派，依靠单个贡献得奖的难度也要大得多。

但同时，在未来十几到几十年里，不难想象中国学者和中国问题研究也有很多突破的机会。一方面，系统接受海外教育，并获得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家越来越多，中国经济学家担任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和国际顶尖期刊编委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加之中国人良好的数理传统，这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学家产生更多更有影响力的作品和学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屠教授和 1998 年获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教授的例子不难看出，当亚洲国家的发展经验足以向全世界推广的时候，它所形成的理论的重要性也必然获得世界的承认。这一点上，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和以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合作实践，为产生重要的新理论提供了最好的支持，也为中国的本土经济学家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和优势。

愿中国经济学的诺奖之梦早日实现。到时，我当请众茶友喝最好的茶一同庆祝！

（作者系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经济学家茶座

总第七十辑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松奇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晓 荆林波
顾海良 梁小民
黄少安 程恩富
蔡继明

主编

胡长青

执行主编

詹小洪

项目负责人

周云龙

本刊得到上海汇智经济学与
管理学发展基金会资助

卷首语

包特 生理学已获诺奖，经济学还有多远？/001

国是我见

徐康宁 陈丰龙 灯火是繁荣的真实记录 / 004

胡怀国 理解中国传统社会 / 010

刘宝宏 “儒学中国”的兴起 / 015

杨汝岱 李艳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
“量变”与“质变” / 020

钟宁桦 户籍制度阻碍我国经济结构再平衡 / 026

学问聊斋

李俊慧 再谈经济学与数学 / 032

皮建才 经济学中思想和模型的匹配问题 / 037

耿兆锐 “中国热”漩涡里的法国重农学派 / 040

邹进文 边缘上的开拓：民国时期经济思想史
博士论文鸟瞰 / 043

柯华庆 刍议新制度经济学的价值论 / 049

学界万象

王军 经济学透视下的性别问题 / 054

冯伟 张玉林 经济类本科生“金融热”
是种理性选择吗？ / 060

生活中的经济学

朱玲 海口家居片段 / 066

党印 人性假设的一连串后果 / 071

李一豪 出国人员购物的演变 / 075

于丽 尹训东 “养儿防老”还是“养儿啃老”？ / 079

宋胜洲 科幻的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之梦（二） / 084

刘瑞明 从行为法经济学看食品安全治理 / 088

经济随笔

陈宪 职业精神是文化之于经济的重器 / 093

胡巍 石头的碎与税 / 099

- 周文 西门庆的经济化人格 / 103
 周燕 两只“虾”的验证 / 109
 沈凌 “马车”上面的“马车夫” / 113
 张霖琳 国企高管职位变动：那些年，那些事 / 115
 吕伟 如何做大体育产业的“蛋糕”？ / 120

经济评论

- 赵红军 教师 Vs 医生，谁的社会贡献更大？ / 124
 陈霞 “关系”在中国公司治理中的价值 / 127
 古志辉 从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看儒家传统与投资者保护 / 132
 刘云 风险社会、风险共治与风险意识 / 137

经济学人

- 蔡晓峰 “杨纪琬计划” / 141

经济史话

- 林超超 社会主义托拉斯为何“夭折”？ / 146
 周明长 “三线建设”与中国内地城市的新生 / 151

财经阅读

- 熊秉元 “没有事实，只有阐释”
 ——《把书读对》一文续貂 / 156
 聂辉华 一个博弈矩阵破解《三体》奥秘 / 161
 李辉文 高级有趣的经济学
 ——《跟〈西游记〉学创业》读后感 / 166

他山之石

- 杜创 硅谷租房故事
 ——也谈“企业、市场与法律” / 169
 包特 BBC“中国学校”说明了什么？ / 1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70辑/
 胡长青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1

ISBN978-7-209-09501-3
 I. ①经… II. ①胡… III. ①经济
 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第017417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 //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903
 Email: chazuo8903@126.com
 微信公众号: cneconomist
 书友QQ群: 311957096
 微博: weibo.com/sdpress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 (0531) 8209802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11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 18.00元



灯火是繁荣的真实记录 / 徐康宁 陈丰龙

一段时期，韩剧《来自星星的你》风靡亚洲，尤其受到中国内地观众和媒体的热烈追捧，剧中人物“都教授”成了最具明星范儿的时尚角色。如果天下真的有外星人，或你能像“都教授”那样从外空中俯瞰地球，那将是一番多么奇妙的景象啊！经济学家不是“都教授”，也和世上绝大多数人一样，无缘在地球之外而去观察地球，但是，经济学理论的直觉告诉我们，假如真的能从几百公里外的太空去看地球的话，地球上的灯火点点一定极不均匀，有的地方繁灯似锦，有的地方孤灯漆黑。世界上反差最大的地方之一就是朝鲜半岛，恰恰是“都教授”的故乡，南边灯光通明，北边黑暗一片。实际上，有人类文明，才有灯火；文明渐渐繁荣了，灯火也会通明起来。灯火是繁荣的真实记录。

一、人工统计财富的缺陷

人类创造了财富以后，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衡量财富？在原始社会，部落酋长是用牛或羊的只数来衡量自己财富的。有了货币以后，尤其是贵金属货币开始流通后，国王和君主是用金银的数量来衡量自己国家的财富，显然，这种财富的衡量是非常粗糙的，只能是一个大致的财富度量。

GDP（国内生产总值）问世后，给各个国家财富的衡量提供了一个可行且比较准确的方法。可以说，GDP是人类在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项发明不仅可以比较准确地衡量一国的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而且让不同的国家和经济体加以比较成为可能，从而能够比较容易地判断出各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当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坚持了自己不同于西方的经济核算体系（统计存在大量重复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几十年后，最后还是纷纷地采用了国际通行的GDP统计（联合国统一的核算体系，简称SNA）。

不过，用GDP来衡量财富和经济增长并非没有问题。问题主要有二：一是统计技术水平，二是人为谬误。无论是采用支出法还是收入法，GDP在经济学原理上都不

复杂,但在实际统计当中,由于需要统计的商品和劳务面广量大、环节多重、口径不一,还是要借助于很高的统计技术水平才能获得高质量的统计结果。许多贫穷落后国家并不具备这种技术水平,这些国家自己统计的GDP在准确性方面常常要打一个大的折扣。一个有意思的例证是,2014年尼日利亚政府宣布,修正本国上一年度的GDP,修正幅度是增加89%,一夜之间不仅财富增加了近一倍,而且超过南非成为非洲最大经济体。至于第二个问题,则主要不是因为技术问题,而是因为有意识差错,通俗地讲,就是统计造假。

中国的GDP以及与此高度关联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世界难得一见的高速增长,1978年至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速达到了9.9%。然而在肯定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中国GDP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却一直备受质疑,这不仅在学术界反复讨论,近年来也常见于一些国际知名媒体,如《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一些国际知名机构如国际能源署(IEA)、国际劳工组织(ILO)等也都在关注中国GDP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统计的真实性或准确性。不容置疑,这些猜疑背后或多或少折射出人们对官方数据的不信任。国内也普遍存在对官方统计数据的某种质疑,尤其是当各地方统计的GDP数据加总后总是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据时,质疑之声常常再度响起。

外界长期怀疑中国官方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其中原因之一是中国使用的统计方法较为陈旧。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脱胎于前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1985年开始采用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年才正式进入SNA体系发展阶段。和20多年前相比,中国的GDP核算体系已经得到很大的改进,统计的真实性和准确度有较大的提高,但仍存在统计口径不一、价格指数不够准确等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计过程中的人为造假。源于传统的制度环境和体制因素,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客观上存在着非技术性差错的问题。这种非技术性差错,是指人为地夸大或缩小数据,扩大经济总量或缩小经济总量。显然,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下,一些地方政府习惯性做的事情,是夸大经济总量数据,而不是相反。这也意味着,中国GDP统计数据不仅存在着技术差错,而且还有非技术差错,即人为因素的差错,换句话讲,某些数据是不真实的、被夸大了的。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中国自1985年开始实行GDP分级核算体制,即中央和地方分别核算GDP,结果是地方统计之和经常高于全国GDP总量,而且这种数据“打架”现象十分突出。有理由相信,剔除统计方法(如跨境重复计算)造成的误差外,地方统计数据造假也被认为是造成中央



与地方数据不同步的重要原因。在官员政绩与 GDP 挂钩的晋级体制下，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可以通过虚构或扩大 GDP 数据来显示政绩，从而获得晋升机会。当这种体制开始主导官员晋升竞争制度的时候，虚构财富和统计造假也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尽管 GDP 的统计方法不断改进，所使用技术也越来越先进和复杂，但由于这种统计本质上是属于人工行为的统计，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就有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区。只要是人工的统计，由于受人的行为影响，哪怕你用再多的计算机和再复杂的数理模型，其结果都有可能出现不真实的一面。同样，前些年在国内比较受推崇的替代性指标，如用电量、运输量等指标，也是人工统计的结果。只要是人工统计的数据，都会有两种可能，其准确性或真实性有可能好于 GDP，也有可能一样或更差。

二、灯光数据提供的机会

由于 GDP 作为一种人工统计的指标，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问题，经济学家们也在努力寻找一种更为客观的办法来记录财富和经济增长。值得庆幸的是，人类的智慧是伟大的，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一些更具有客观价值的大样本数据逐步被发现和应用，使得从另外的角度记录财富和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近年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发布的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以下简称“灯光数据”）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该数据是由卫星从外太空所观察到的地球不同地区在晚间八点半至十点之间的灯光亮度（消除了云、月光及火光等偶然因素影响）。灯光数据是由美国空军一系列气象卫星观测所得，这些卫星属于美国国防气象卫星计划（DMSP）。该计划源自 1976 年发射的 F-1 卫星上首次搭载相关传感器（OLS），运行在距离地球表面约 830 公里的近极地太阳同步轨道。与一般传感器不同的是，该传感器的设计目的是观测夜间月光照射下的云层分布、云顶温度等，而非获取太阳光辐射地表后反射的信号，因而该传感器具有较高的光电放大能力，可探测到城市夜间的灯光、火光乃至车流等发出的低强度灯光。因此，夜间灯光作为人类活动的表征，可以成为人类活动监测研究的良好数据来源。

相对于 GDP 统计数据而言，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显得更加客观，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人为因素。灯光亮度反映了一个地区夜间的照明强度，而夜间照明强度则反映了该地区的夜间经济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所有经济活动都会存续于夜间表现，而灯光是夜间表现的显性信息，经济活动强度越大，夜间表现也一定强烈，灯光的亮度也会越明显。夜间灯光亮度更突出了现代经济活动的特征，如城市扩张、人口流动、经济集

聚等，而这些因素也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最为直观并形成显著反差的事实是，朝鲜半岛的南部（韩国）经济活动频繁，夜间灯光闪烁夺目；而北部（朝鲜）经济凋敝，夜间黑暗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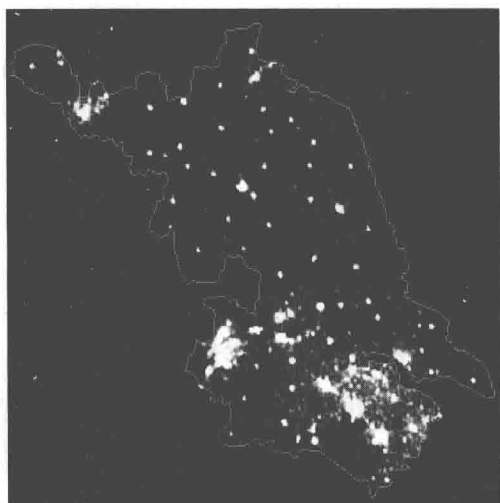
利用卫星的夜间灯光数据做应用研究在国外已有尝试，原来主要见于地理学科和遥感测绘学科领域，如今也开始被经济学家应用于相关研究之中，比较经典的文献是美国布朗大学的汉德森（Henderson）等人201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从外空测度经济增长》（*Measur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Out Space*）一文。这篇文章主要依据卫星观测到的地球夜间灯光数据，对世界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做了测度，重点研究对象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研究结果发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沿海地区的实际经济增长要低于官方统计数据，而最不发达的内陆地区实际经济增长要高于官方统计数据。

我们一直在关注利用更加客观的数据测度经济活动的学术研究进展，并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尝试加入地理变量。已经发表的文章主要涉及长期经济增长、国际分工、FDI流动、厂商选址理论等，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等刊物上。最早的一篇是2006年1月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一文，迄今已近10年。目前，这篇文章还是国内同领域研究引用率最高的一篇文献，国外熟悉中文阅读的学者也在发表的文章中引用过该文。受汉德森等人研究的启发，我们对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测度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耗时半年，写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的检验：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的检验》一文。目前，这篇文章已经在《经济研究》2015年第9期上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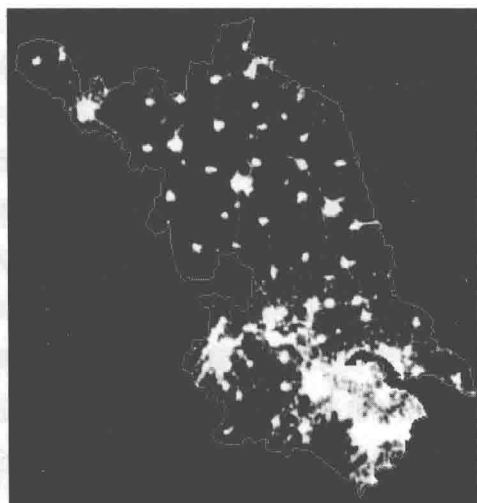
我们之所以尝试用夜间灯光数据测度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一是坚信灯光数据不会造假，可以克服任何人工的误差乃至作伪的痕迹；二是这套数据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下载获取；三是力求在研究性地记录繁荣与财富方面开辟一个视角。从已经见到的公开文献看，我们的这项研究在中国还是最早的。

三、灯光数据记录的中国经济增长

如同新药研发和使用有一个临床试验阶段一样，我们先用统计的办法观察夜间灯光数据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吻合情况。我们以笔者所在的江苏为例，揭示灯光数据所提供的信息及其涵义。下面是江苏省1992年和2012年夜间灯光亮度图，从中可以看出，



1992 年



2012 年

江苏夜间灯光亮度分布：1992 VS 2012（数据来源：NOAA）

1992 年江苏灯光最亮地区位于苏南，而苏北地区的灯光相对较弱且比较分散；2012 年江苏灯光亮度的格局没有改变，苏南依然是灯光最亮的区域，且亮度显著增强，苏北的灯光亮度尽管仍比较分散，但亮度也明显提高，但苏南苏北的灯光亮度差异变大了。事实上，苏南、苏北经济规模的长期变化与灯光亮度的演变趋势是基本一致的，灯光亮度实际上也反映了江苏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演变格局。苏南尤其是苏锡常地区（苏州、无锡、常州），之所以灯光亮度较高，与其高度集聚的经济特征密切相关。

我们依据灯光数据测算了中国及其各省份过去 20 年（1992—2012）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结果发现，无论是全国整体还是各个省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官方统计的 GDP 增长率之间均不完全吻合，其中前者要略低于后者，这也意味着官方统计的 GDP 增长率存在着高估倾向，换句话说，官方统计的 GDP 增速由于种种原因而“发胀”了，但高估的幅度并没有一些国外学者和媒体所认为的那么大。

具体而言，全国整体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值为 9.13%，官方统计的数据为 10.15%，两者相差 1.02 个百分点。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比官方统计的 GDP 增长率平均低约 1.5—1.8 个百分点，这一差距略高于全国整体水平。这样的检验结果，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即剔除了统计误差等技术原因，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人为编造数据的可能性更高。

全国大部分省份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官方统计的 GDP 增长率之间有近两个百分点的差距，其中北京差距最小，西藏差距最大。尽管这一差距不如外界质疑的那么大，但也足以反映出中国 GDP 统计数据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包括技术和制度上的问题。此外，各省份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官方数据之间的差距普遍高于全国，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为什么一直以来中央和地方 GDP 数据经常出现“打架”现象。我们认为，除了统计技术水平的差异外，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越是基层一级的地方，官方 GDP 统计数越具有高估倾向。

有必要说明，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测度实际经济增长率，其可用的价值范围有一定的限度。一是主要用于测度长期增长，若是仅仅测度一年或很短时间的经济增长率，意义不大；二是主要用于统计技术相对落后或存在人为造假因素的地方。若没有这两个条件，也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去另辟蹊径测度财富和经济增长。关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具体应用分析，有兴趣的作者可参见我们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另外，尽管我们不敢言用夜间灯光数据来测度长期经济增长是 100% 的准确，但出于一个新的视角对 GDP 数据做必要的“补缺”，何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辛弃疾在其《青玉案·元夕》这首词中描写了词人与百姓共度上元节的繁盛景象，也是那个物质文明达到巅峰的宋代中国的真实写照。没有灯花齐放，何来宝马雕车？灯火的确是繁荣的真实记录。

（徐康宁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丰龙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理解中国传统社会 / 胡怀国

一、引言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及其行为选择模式，是经济学家适宜的关注对象。然而，尽管中国数千年来的史料典籍浩如烟海、史学成果汗牛充栋，当我们试图了解普通民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状况时，颇令人意外而又遗憾的是，我们其实知之甚少！大部分史料典籍涉及的是“帝王将相”等少数群体和相对宏大的事件，对更重要、更具普遍意义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则缺乏足够的关注。至少在理论经济学家看来，这是缺乏微观基础的。

最近两年，笔者断断续续写了几篇小文，包括：《中国传统社会的累退性税制结构：基于帕累托分布的讨论》（《财贸经济》2014年第9期）、《中国传统社会的“国营农场”及其转轨路径：兼论古代屯田的制度背景与演进逻辑》（《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5期）、《重塑现代市场经济的人文基础：基于亚当·斯密学术思想的初步考察》（投稿中）等，对中国传统社会均有所涉及，但在研究起步阶段皆遇到一定的困惑。在解决自身困惑的过程中，感觉现有文献并不够用，而按部就班的研究方法则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故不得不尝试另辟蹊径！

具体而言，现有史料典籍过于浩瀚，动辄数百成千上万卷；史学研究，经常在大量史料典籍中引来引去，半天看不出所以然。在这种情况下，再说数千年的事情，就是一件事，也得“破万卷书”，不知折腾多少年，还不一定能折腾明白。权衡利弊、兼虑可行性，笔者尝试采用一种理论史学方法或“贝叶斯估计法”：先有一个先验的主观估计，其后借助于阅读史料典籍等原始文献，不断修正有关核心参数，直至其后验概率分布趋于稳定并大致够理论分析之用。这种方法，通俗点讲就是“找感觉”，而如果一定要寻找到文献出处（方法论基础），那么应该主要归功于亚当·斯密的启发，有关细节参见笔者小文：《对斯密研究方法的评价与新评价》（《学术交流》1999年第5期）和《斯密思想体系的一致性》（《经济科学》1999年第4期）等。

按此方法，进展相对顺利，但数千年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仍难以在短期之内“找到感觉”（参数仍不稳定）。尽管如此，同普通老百姓生活有关的一些问题，断断续续小有感觉；作为尝试，此文先论宏观背景，即针对不同时代，找找大致感觉。值得说明的是，小文之所以花这么多篇幅做方法论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表明其局限性：其一，这是一种主观的方法；其二，这是一种间接的方法；其三，有关分析主要服务于自己对有关问题的思考，换种角度未必合适，故人们未必认同（但有助于形成一种参考基准或批驳对象）。此外，为行文简洁，后文重点探讨秦汉、隋唐、两宋和明清等主要朝代，且只谈“结果”，尽量不涉及“证据”与论证细节。

二、秦汉体制

秦汉以降的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在两千余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维持着一种不同于欧洲等其他经济体而颇具‘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微观基础，即基于郡县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基于‘编户齐民’的微观社会经济基础，其持续时间之久、适用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生命力之强均在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肇始于商鞅变法的“郡县体系－编户齐民模式”，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奠基性的重要意义：郡县体系增强了国家控制力和行政效率，使得中国在两千余年前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大一统格局；而编户齐民模式，至少在理论上有助于相对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的形成（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封建割据乃至工业革命初期仍存在强大约束力的行会制和教区制等，欧洲还要等很久）。这是一种相当超前的制度设计，尽管在实践层面会面临一系列困难，但确实是一种有着强大生命力和相对稳定性的制度性框架。这是西戎边陲之地的秦王国对中华民族的重要贡献，并随着秦统一六国，渐次推进到中国大部分地区，成为影响中国两千余年历史进程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

秦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当关内各诸侯国为“名分”和“道德高地”穷折腾的时候，“没有文化”和历史负担、追求简单实用的秦国正在西掠广袤腹地，并在“以草茅之地，徠三晋之民”（《商君书·徠民》）的政策下，吸引了中原腹地的大批人才。有理由相信，编户齐民模式在秦国得到了较有成效的执行，但在“统一六国”后的中原腹地，其有效性成疑。由此也不难理解，虽说“汉承秦制”，但其力度和有效性是大打折扣的：尽管“编户齐民”在理论上享有相对独立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法律权利，但皇亲国戚、世族勋贵，在土地占有、免役特权、人身自由等方面，比通常意义上的“编户齐民”拥有更多的优势，甚至能够同中央政府“争夺”对编户齐民的控制能力；中



国在两汉之后进入“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对峙”等“大分裂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央政府、世族豪门、编户齐民三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在两汉魏晋时期，世族豪门的坐大甚或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似乎是一个不断趋于强化的过程，东晋时期甚至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未必很糟糕，但世族勋贵和普通编户齐民之间的政治权利、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广泛的差异，整个收入差距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简言之，秦朝构建的基本框架，两汉魏晋大致延续了下来，但越来越难（微观基础趋于削弱），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点徒有其名的味道。尽管如此，考虑到农耕社会的特点、汉代农业技术水平等因素，至少在承平时期（无战乱）和公共支出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尽管收入差距相对大些，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应该还是不错的。

三、隋唐两宋

隋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次重大转折，而魏晋南北朝则是秦汉与隋唐之间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其中，东晋和南朝政权，大致延续了中原汉族政权的基本制度和内在演进逻辑，世族豪门、门阀世家渐次坐大（收入差距较大），不断从中央政府手中取得更多的控制权（决策分散性和区域竞争性，有利于经济增长），再加上“大分裂时代”的战火很少烧到长江以南（公共支出少、税负轻），故东晋与南朝的社会经济的特点应该是：尽管有着分配不公和阶层利益固化的缺点，但却因政府干预的减弱和地方竞争性的增强，而有助于市场关系的发育，有利于激发微观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增长。与之不同，北朝各政权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多数政权似乎绑架在军事战车上，行为果敢决绝甚或残忍血腥，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渐次增强，其主要特点应该是：中央集权程度和行政效率相对较高，军事化程度和战斗力较强，但公共负担较重，人们的选择自由少，普通老百姓处于一种相对平等的穷困状态。简言之，南朝的特点是不平等的繁荣，北朝则是一种平等的贫困。

隋唐的制度框架主要延续北朝——北魏孝文帝改革、北周“宇文泰—苏绰”改革等一脉相承，隋朝源于北周政权的和平“禅让”，唐承隋制。当北朝的“强政府”遇上南朝的繁华市场，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国家的富强”（钱都搂到国家手里了，老百姓的富裕情况有待进一步考察）。从某种程度上讲，安史之乱以前的隋唐，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最有钱”的历史时期。不过，隋唐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重大意义，是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微观基础，此亦为本文称其为“隋唐转折”的原因。

隋唐政权对社会经济的强力控制，加上均田制、科举制、府兵制的普遍推广，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微观基础：隋唐以来，世族豪门渐次坐大的趋势得到彻底扭转；编户齐民之间虽有收入差别和阶层分化，但世族豪门已不可能像秦汉时期那样拥有如此多的资源、享有如此多的特权，不得不更多地通过市场关系（如租佃制）而非人身依附关系，来获取所需的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这是一种新的内在演进逻辑，并最终演化为市场关系相对发达的两宋社会。

安史之乱以后，尽管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大为弱化，但社会经济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并从此进入一种新的演进逻辑。至少从“编户齐民”微观基础的角度，晚唐和两宋其实是很相似的，这是一个市场关系渐次得到发育的时期，也是老百姓逐渐过上好日子的时期（尤其是在没有大的战争战乱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至少从老百姓过日子的角度，最富裕、最相对公正的时期，应该是两宋。

四、明清时期

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两次大的转折，分别为隋唐和明清。从某种程度上讲，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人文地理看夏商、文化思想看先秦、政治框架看秦汉、行政构架看隋唐、社会经济看两宋、近现代的纠结演进则看明清：秦汉至两宋，分别从不同维度推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演进；至于明清，历来是国内外“现代学术”的关注重点，但其实同中国传统社会已有很大差别，我个人还是更愿意把它归结为近现代社会之过渡时期（现实痕迹亦多矣），而不是纯粹的中国传统社会。

同“秦汉—两宋”期间的演进逻辑不同，至少在微观基础和治理理念方面，明清更多地继承了辽金元的简单粗暴准军事特征，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相对纠结。不仅微观基础和市场活力低于两宋，而且整个社会的“和谐度”亦有明显下降：两宋时期，官员互殴、违背圣意，最多调职或谪贬，很少被杀被砍被羞辱，通常为对方留有足够的尊严，比如王安石变法，来来回回折腾数朝，然变法者仍能善终，似乎只能发生在宋代，与秦代被车裂诛族的商鞅、明代被鞭尸抄家的张居正有很大的不同；明清，则动不动就是砍头诛族，甚至剥皮示众，社会各阶层普遍缺乏尊严。新皇帝就职不捧场（方孝孺拒绝为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而被诛灭“十族”，似乎也只有明朝才合乎逻辑。

相较于其他时代，明清时代在劳动自由、资本安全和人的尊严等方面有所退步，斯密所说的“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富论》上



卷，商务版第87页），指的应该就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明清继承金元政权，在编户齐民和市场关系等方面的历史倒退，突出表现在人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和身份转换困难。具体而言，作为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元崛起之初多实行“壮者皆兵”军事体制，入主中原后则通常会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明清大致继承了这种“人分类、户有别”的体制，如明朝时期“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明史》第78卷）。

普通老百姓，如果不能自由选择职业并凭借自身努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生境遇，那么有关制度安排就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缺乏效率的；在此情况下，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就高不到哪里去，如斯密曾提及“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国富论》上卷，商务版第65页），说的就是元明清时期的老百姓生活状况。而对于“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问题，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老百姓就已经能够大致解决了，如战国初期的李悝（前455—前395年）的估算是：户均产粮150石，税后余135石，不仅足够一家人的口粮（90石），而且还有45石剩余（《汉书·食货志》）；而稍后的孟子则给出了一般性的估计值：“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章句》）

简言之，明清时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肯定低于两宋时期；至于其能否超过秦汉隋唐时期，亦不宜乐观，有待进一步考证。明清时期的皇家相对舒服些，但也不是没有代价：不论是明末还是清末，当皇权遭受内部或外部冲击摇摇欲坠之时，老百姓大多围观“看热闹”。貌似强大，轰然倒塌，害得明末崇祯皇帝上了吊、晚清皇家也是没有多少人帮衬（与宋末的同仇敌忾有天壤之别）。

五、结语

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间的中国传统社会，就主要朝代与大部分时期而言（秦汉、隋唐、两宋、明清，计千六百余年或约占八成时段），若一言蔽之，可概括如下：两汉收入差距稍大、隋唐国家强、两宋百姓富、明清比较纠结。国强不等于民富，军事战斗力强不等于老百姓生活质量高；至少从老百姓过日子的角度，人们对东晋、南朝、南宋等偏安政权的评价和感觉，或存在严重低估；唐宋文学艺术之兴盛、南朝南宋科学技术之勃发，或非偶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儒学中国”^[1]的兴起 / 刘宝宏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儒学并非显学，甚至被认为是“无用之学”，以至于孔子率众弟子游说各诸侯国，成效寥寥，被讥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大秦帝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法家，法家思想随着秦的兴起而一度支配了整个中国，儒生与新政府对抗，结果不断遭到排挤、打压。所谓的“焚书坑儒”虽然与史实有所不符，但却也可窥一斑。汉初，高祖刘邦同样对儒家不待见，甚至用小便侮辱儒生的帽子。“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妇孺皆知的历史事实。但是，倘若追问一句为什么，大多数人就可能不知所以。特别是，考虑到儒学在武帝之前的社会地位，天壤之别的反差更是让人好奇：儒学的兴起为何是在武帝时期？儒学的统治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儒学中国”的兴起意味着什么？

一、“独尊儒术”的真相

张五常说，经济解释“最麻烦的就是你解释根本不存在的现象”。因此，在解释“儒学中国”的兴起之前，有必要首先揭示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相。

众所周知，草莽出身的刘邦建立汉朝之初，“约法三章”仅是一时权宜之计，其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依然是“汉承秦制”，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只是去掉了秦法中少数最残酷的条文。及至武帝时代，法律虽随情势有所调整与完善，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非但没有降低，甚至有所提高。比如，武帝于元光五年（前 130 年）命张汤、赵禹共定律令，其中的“见知法”便规定，如看到或者知道别人犯法而不检举者，便与犯者同罪，这几乎等于“秦法的复活”。武帝任用的酷吏如义纵、王温舒等，曾有一日杀数百人甚至一次毁灭千余家的记录。

〔1〕在史学界，有所谓“儒教中国”的提法，但考虑到儒学是否宗教聚讼纷纭，所以，本文采用相对中性的“儒学中国”一词。加之汉代以后的中国，虽然儒学居国家文化主流地位，但佛教、道教等也在不同时期占有重要位置，为免误解，故在“儒学中国”之上加双引号。